

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发展的若干因素(1368–1840)

王洪伟 盛邦跃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明代至清代中期,蚕桑业在全国其它地区衰废不举,而在江南地区却趋于繁荣。江南蚕桑业发展的因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二者相互交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蚕桑业利润较高,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减轻赋税负担,当地很多农民改稻种桑。其次,国内外市场蚕丝需求量的增长,刺激江南地区扩大蚕桑生产。再次,当地的水土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荡田及早地的开发,促进了桑树栽植。最后,以蚕月禁忌和蚕神祭拜为主要内容的尚桑重蚕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蚕桑业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蚕桑业;发展因素;明清时期;江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1-0069-06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Factors of the Jiangnan Sericulture Industr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Hong-wei SHENG Bang-yue

(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368–1840), the sericulture industry in many regions of the country was declining, but it was booming in Jiangnan area, which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tion area of silkworm nationwide. There are four main reasons behind this phenomenon. Firstly, because of the high profit of the silkworm mulberry industry, many farmers in Jiangnan area began to grow mulberry instead of rice to seek more economic benefits and reduce tax burdens. Secondly,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silk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boomed the silkworm industry in Jiangnan area. Thirdly, the chang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Jiangnan are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hoaly land and dry land promoted the planting of mulberry tre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ulberry leaves. Fourthly, the Chinese customs on silkworm and mulberry trees were especially rich and colorful in Jiangnan area featuring silkworm month taboo and silkworm god worship,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guarantees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silkworm industry.

Key words: history of sericul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factor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angnan area

明清时期,全国很多地区的蚕桑业衰废不举,而江南地区却因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其它社会历史因素的刺激,蚕桑业日益繁荣,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蚕桑产区。到了清末,由于西方列强的掠夺和国际市场的冲击,江南地区蚕桑业开始由兴盛走向衰落。以往关于江南地区蚕桑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其

【收稿日期】2017-10-10

【作者简介】王洪伟(1975—),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盛邦跃(1959—),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科学思想史。

中涉及蚕桑科技、蚕桑经济、蚕桑地理以及蚕桑生态等方面的内容^①。也有学者专文探讨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桑生产发展的过程及原因,如章楷《明清时代太湖地区蚕桑兴衰考》(农业出版社,1983年),林荣琴《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田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及其原因》(《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3期)等,只是已有论著的原因分析偏重于社会经济因素,对于水土资源以及民俗文化因素关注不够。本文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特点,试图从多个视角重新探讨明清江南地区蚕桑业的发展因素。

一、蚕桑业利润较高

明清时期,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减轻赋税负担,江南农民纷纷以经济利益为导向,采取以副养农、以工养农的自救措施,尽力维持生计。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以杭嘉湖和苏州一带为核心,江南地区的蚕桑生产得到了迅猛发展。

明末清初湖州人张履祥曾对种粮和种桑的收益作过比较:“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闲;田赴时急,地赴时缓;田忧水旱,地不忧水旱。俗云:千日田头,一日地头,是已。”意思是说,种稻比种桑费工费时,而且易受水旱影响。尤其是种一亩地的桑树,“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米甚贵,丝甚贱,尚足与田相准。”明代《吴兴掌故集》中也说:“大约良田一亩,可得叶八十箇,每二十斤为一箇,计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②最好的年成,种桑的收入比种粮高五六倍,正常年份高两三倍,最差的年景也不低于种粮。所以,张履祥又说,“种田利最薄”,只是“化无用为有用”^③。一般农户未必计算得这样细致,但种桑省工省肥,不忧水旱,获利又高,在当时确是事实。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农民自然会选择栽桑养蚕。另外,明清货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农户可以通过养蚕售丝,获取更多的收入,并以银易米,来弥补粮食的不足。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很多稻田改种棉花和桑树,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植棉栽桑的利润远远高于种稻的收入。

今人对明清时期蚕桑业的利润问题也做过不少研究。据李伯重先生推算,明代后期就净产值来说,桑园与稻田的实际比例大约为2:1,亦即桑每亩产值是稻的2倍上下。到了清代,蚕桑业的利润比明代更大。乾隆年间,在一般情况下,每亩桑地的收益,相当于良田或中等水稻田收入的3.36倍至4.3倍^④。此外,出售桑苗收益可观,张履祥《补农书》曰:“每地可得桑秧数百枝,叶复不少,得利厚而力又不费。”湖桑苗不仅内销于无锡、武进、苏州等地,还远销全国各地,一亩桑苗至少能卖五六十千文,而一年稻麦两熟的净利润也不过七千文^⑤。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江南地区农民积极从事蚕桑生产。

蚕桑业生产的利润,不仅局限于桑田,养蚕和缫丝也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章楷认为,鸦片战争之

① 杨源时:《嘉湖地区蚕桑生产的若干历史经验》,《浙江农业科学》1963年6期;郑云飞:《明清时期的湖丝与杭嘉湖地区的蚕业技术》,《中国农史》1991年第4期;李伯重:《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农业考古》1995年第3-4期;周晴:《河网、湿地与蚕桑——嘉湖平原生态史研究(9-17世纪)》,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另外,关于江南经济史的论著中,往往包含了蚕桑业的内容,如斯波义信、滨岛敦俊、田民利、郑学檬、樊树志、李伯重、范金民等的相关探讨;在关于江南农业史及生态史的论著中,包含了对蚕桑科技及生态的探讨,如陈恒力、王达、章楷、闻大中、俞荣梁、王建革等的研究。

② [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3《物产》。

③ [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注:《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

④ 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⑤ 章楷:《近代江南地区的蚕桑丝茧贸易》,出自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江南地区农史论文集》,1985年,第43页。

前,嘉湖地区栽桑的利润不一定比种粮食高,必须栽桑、养蚕而又缫丝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因为桑叶不能长期贮存,销路不旺的话,就将蒙受很大损失,远不如种稻安全。栽桑而又养蚕缫丝,才能提高产值。嘉庆《余杭县志》“物产”中说,由于余杭的土蚕种比较优良,所以“乡人牟利,趋之若鹜”。清末光绪年间,外商到江阴买蚕茧,导致“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①在常州、苏州一带售茧“每届可得洋四五百万元,为此业绝大利源。”^②光绪二十年(1894)左右,吕桂芬在其《劝种桑说》中提到,“前此蚕茧每斤值价二百数十文,现今则每斤值钱四百数十文。”这里的前此和现今,应是清末洋商在江南地区收蚕茧之前和之后,外商的大量收购导致蚕茧价格在短期内上涨近一倍。就是说,养蚕并售卖蚕茧的收益也比以前大为提高。

如果缫丝和丝织技术出色,又会使得蚕桑业的利润倍增。明中叶以来,辑里湖丝畅销于海外,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牟利商品。明末傅元初《请开洋禁疏》云:“其土(西洋)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输往日本等国,其利更厚,“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取去者其价十倍”^③。万历十年(1582),中国白丝每年输日达20万斤,辑里丝是出口丝中的上品。天启末,输日精丝三千担,粗丝五百担。清内务府档案资料显示,乾隆十八年(1753)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10年间,南浔、双林、新市和余杭的丝价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百。可见,蚕桑生产过程的利润附加值比较高。民国初年,江南地区的缫丝厂纷纷建立,对蚕茧的需求量又有增加。一般来说,栽桑收茧比种粮收益至少要高出四至五倍^④,这就导致了江南地区的农民纷纷改营蚕桑,而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也愈加讲求蚕桑生产技术的改进。

二、国内外蚕丝需求增长的拉动

国内外蚕丝需求量的增长与前述因素相关联,是导致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蚕桑业兴盛的市场动力。唐宋以来,江南地区的生丝和丝织品质量逐步提高,已达到其它地区难以超越的地步。这里的丝织品长期属于大宗输出商品,不但国内市场需求量很大,海外市场的需求量也在逐渐增长。市场需求的刺激,进一步促使明代之后江南地区蚕桑业走向兴旺发达。

明清时期,中国国内的丝织品消费市场以江南地区的生丝和丝织品为主,广东、福建以及江宁府的丝织品的织造原料也都使用湖丝,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所需要的绸缎大部分来自江南地区。除此之外,由于政府规定赋税要征收一定数量的丝织品等实物,一些蚕业生产技术欠发达的地区,就需要向江南地区购买符合官捐标准的丝织物。据乾隆时期的山西《潞州府志》记载:“每岁织造之令一至,比户惊慌。本地无丝可买,远走江浙买办湖丝。”关于19世纪中期以前江南地区生丝和丝织品输往全国的数量,吴承明、范金民和李伯重等学者做过细致考察。吴承明认为,明代后期江南地区输往国内其他地区的丝织品数量,每年大约为30万匹,值银30万两。范金民估算,16世纪后期江南地区每年输往国内市场的丝制品大约为54万匹湖州绢,值银38万两。到了19世纪初,数量急剧上升,大约为1400万濮院绸,值银1500万两。李伯重则说,江南地区输往中国国内的丝,应该是从17世纪初期的21000担增加到在19世纪中叶的61000担,输出规模在两个世纪之内增加了2倍,丝的总产量从42000担增加到90000担^⑤。由于着眼点有差异,三位研究者所测算的数量有所不同,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江

① 夏孙桐:《族祖涤初先生家传》,《观所尚斋文存》卷7,第14页。

② 《江苏藩司裴臬司朱告蚕户示》,《农学报》第56期,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

③ [明]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4《丝》,明天启四年1624年胡维极刻本。

④ 章楷:《漫谈历史上的江苏蚕业》,《江苏蚕业》1979年第1期。

⑤ 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4-117页。

南地区蚕丝输出量的增长非常迅速,也反映出国内蚕丝消费市场对江南丝织品的需求很旺盛。

明代海外市场的需求与购买和丝织品的主力是日本,其次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另外荷兰也有一部分,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江南地区。在清代前中期中国海外输出的丝和丝织品中,江南产品仍占主体。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曰: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夷^①。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生丝成为外国列强争相掠夺的主要物资。上海口岸开放,江南丝输出量再次大幅度增长,尤其是输往欧美的生丝数量迅速增加,1840年代末出口总量达到16000担^②。

另外,近代江南地区以丝棉纺织业和粮食加工业为特色的民族工业的兴起,也对当地蚕丝需求的增长以及蚕桑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江南地区的民族机器缫丝业开端于浙江丝商1882年在上海创办的公和永缫丝厂,后来逐步扩展到江苏的镇江、苏州、无锡、丹徒和浙江的萧山、杭州、湖州以及绍兴等地。从1895年到1899年,全国新设机器缫丝厂66家,资本725.1万元(内有6家缺资本记载),40家在江南地区。江南地区又以上海为最多,有18家,资本526.3万元(内有5家缺资本记载),资本额占总数的72.5%^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民族工商业发展相对较好的时期,江南地区这些缫丝厂的建立和蚕茧需求,必然会促进当地蚕桑生产的增长。

三、土地资源开发的推进

宋元时期,江南平原地区围湖造田现象严重,水旱灾害频发。为了趋利避害,江南地区的塘堤圩岸及房前屋后植桑比较普遍,蚕桑生产趋于兴盛。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水土环境再次发生较大变化,蚕桑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圩田、荡地以及旱地的开发利用为基础^④。

江南地区的田地类型一般分为田、地、山、荡四种^⑤。田是水田,一般种水稻,地即旱地,一般种桑,山指丘陵山地,荡即水域。另据同治《湖州府志》记载,在湖州等地,这几类基本田地又被细分为多个类型,如田又有一般田、圩田、地成田、山成田、荡田的区别。其中荡田又称圩荡田,在江南地区尤其是平原水网区,圩田、荡田的圩堤多用于植桑。其中圩荡田的开发始于唐,盛于宋,明清继续推进。在太湖平原的低洼地区,“皆筑堤于水中”,形成田中有水,水中有田的岛状圩田,此即圩荡田的典型景象。由于挖掘河泥,垫高田面,沿河港筑起较高的圩埂,形成一个个四周环河的“圩头”形成的岛状陆地,圩头大的数百亩,小的只数亩或数分^⑥。

圩荡田的开发重点在于圩岸,而圩岸正是栽桑之处。明代朱国祯曾说,湖州地区的圩荡田开发首在堤利:“堤之功莫利于下乡之田。”^⑦据《南浔镇志》记载,在低洼积水区修筑能够栽种桑树的宽广堤岸,需要把栽种芦苇、杨树和培土结合起来,花费数年功夫,不断地筑实修补。堤成植桑之后还要注意随时加以增筑和维护。因平原低洼地区经常遭受雨涝灾害,荡埂、圩埂上的桑地水土流失严重,导致桑根外露。如果不积极挽救,就会影响桑树的生长发育。所以如何管理水涝后的桑园,是低洼荡田地区桑

①《李侍尧奏请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准其出口折》,见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史料旬刊》第5期,见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第317页。

②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2006年,第112-113页。

③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第1216页。

④周晴:《明清时期嘉湖平原的植桑生态》,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⑤[明]成化《湖州府志》卷8。

⑥浙江省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工作委员会编:《浙江土壤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70页。

⑦[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6“堤利”。

树种植的关键,民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抓住时机,用秋冬季的河泥或人粪尿,羊肥壅培桑地,并为桑根培土,从而保障了桑树的正常生长。在嘉湖平原上,圩荡田以湖州所占较多,而湖州的圩荡田又多半集中中部偏南的菱湖、双林、南浔一带。在圩荡田地区,清代到处都是“漾脚藕花三四里,堤根桑树万千株”的景观^①。这种桑林景观的形成,正是与当地水土环境以及精细的田地利用措施分不开的。

不过,由于地势低洼、水宽地狭,蚕业繁荣时,湖州许多地方,虽然遍野栽桑,但桑叶供应仍然不足,这就造成了江南平原地区蚕桑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因“桑地宜高平不宜低湿,高平处宜培土深厚。”^②但水多地少的地区,无法获得大量培土,雨涝也对桑树危害较大,如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家家门外桑阴绕,不患叶稀患地少”^③。明人朱国祯曾说:“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本地叶不足,又贩于桐乡、洞庭。”乌镇等不少市镇则因为桑叶贸易而繁荣起来^④。就是说,在靠近太湖南岸的嘉湖平原北部地区,以及东苕溪以东的部分低洼地区,植桑不能满足养蚕之需,不得不求购于嘉兴的桐乡、石门。

与北部低洼地区相比,桐乡、石门一带地势较高,嘉兴“土高水狭而浅,颇不利于田,因多改之地,种桑植烟。”^⑤关于桐乡、石门一带植桑兴盛的原因,张履祥《补农书》以及嘉庆《嘉兴县志》均将之归咎于“风土稍殊,事力各异”^⑥。虽然同处于水网平原,但桐乡、石门一带在微地形上与其北部地区有所差别,能用来种桑树的旱地更多^⑦。到了清末,海盐蚕桑业兴盛之时,也须向桐乡买叶:“盐邑地狭人众,力耕不足糊口,比户养蚕为急务。……墙隙田旁悉树桑叶,千斤养蚕十斤,谓之本分蚕。蚕多叶少,为空头蚕,必买叶饲养之。轻舫飞棹四出远买,虽百里外一昼夜必达。”^⑧因为种桑的收入大大高于稻田的收入,这使得桐乡、石门一带的农民形成了重桑轻蚕风俗。在缺叶的年份,桑叶价格上涨,桐乡农民则宁愿弃蚕卖叶,这实际上保障了北部蚕区的蚕桑业发展。

四、尚桑重蚕习俗的作用

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是江南地区民众重要的生计来源。明万历《崇德县志》“纪疆”记载:“语溪(崇德)无闲塘,上下地必植桑,富者等候封,培壅茂美,不必以亩计;贫者数弓之宅地,小隙必栽,沃若连属,蚕月无不育之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其他蚕桑州县的情况与此相类似。在长期的蚕桑生产活动中,当地老百姓与天地自然相抗争,在植桑、采桑、养蚕、结茧、缫丝、织绸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蚕桑^⑨。各地传统的蚕桑习俗并非完全相同(表1),不过大致都是以饲蚕期要避免亲朋往来等禁忌和祭拜蚕神为主要内容。这些习俗对当地养蚕业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一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养蚕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且传统上多由妇女承担,其中宜忌讲究颇多。清代纪松的《蚕妇怨》中说:“出门采柔桑,入门饲蚕忙。桃花已落尽,夏景日渐长。家家试新火,户户早凝妆。有郎不同宿,有酒不能唱。中霄频起看,揽衣独彷徨。吁嗟乎!辛苦倍更长。”^⑩杭州“蚕月邻里水火不相借,至蚕熟茧成,

① [清]姚彦渠:《菱湖志》卷2。

② [清]孙志熊撰:《菱湖镇志》卷12《蚕桑》。

③ [清]汪曰桢纂:《南浔镇志》同治刻本,董蠡舟《稍叶》,方焘《愁霖行》。

④ [清]汪曰桢纂:《南浔镇志》同治刻本,董蠡舟《稍叶》。

⑤ 光绪《嘉兴府志》卷末旧序引康熙县志序。

⑥ [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注:《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嘉庆《嘉兴县志》卷16。

⑦ 周晴:《明清时期嘉湖平原的植桑生态》,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46页。

⑧ [清]于尚龄等修:《嘉兴府志》卷11《农桑》,清道光三年刻本。

⑨ 林锡旦:《太湖蚕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⑩ [清]纪松:《蚕妇怨》,《南浔镇志》,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第400页。

始向问慰,点茶为乐”^①。蚕熟成茧是关键环节,决定一年的收成,因此当地老百姓特别重视。蚕月不互相串门,一来是人们都关注蚕事,无暇他顾,二来也是为了避免蚕病传染。此类风俗,在江南地区各府县志中有较多记载。例如,《菱湖镇志》记载,蚕的浴种要挑在蚕的生日(腊月十二日)进行,护种则在清明谷雨前后。一般来说,清明前后是养蚕开始的时节,蚕户就忙碌起来了,这个时候要求“关蚕房门”：“收蚕之日,即以红纸书‘育蚕’二字,或书‘蚕月知礼’四字,贴于门,猝遇宾至,即惧为蚕祟。”^②“忌蚕之说,乡人最信,往往用芦帘围住,不使人出入,稍有变端,即占卜祷祝,或谓生客所冲,或谓阴气所犯。虽属附会,然旁人知其忌蚕,必须谨避,应不致归咎也。有实际忌者,曰雨、曰雾、曰黄沙、曰气水叶、曰烟气、曰油气(熬热油尤忌)、曰酒气、曰秽浊气。”^③

蚕桑祭祀也是江南地区比较重要的民俗,当地有修建蚕神庙、机神庙和举办蚕花会等活动。各地民间在机户聚集地都会修建机神庙,以祭祀纺织业的始祖。像杭州的忠清里、饮马井巷和艮山门,苏州的玄妙观和花桥阁等地,都修有当地比较大的机神庙。其中既有官工匠和小手工业者捐建的,也有大机房主和官方织染局建立的。每年春秋之际,都要在此进行祭祀活动。蚕花会是蚕乡祭拜蚕丝业的先祖蚕花娘娘的一种活动,一般在清明前后举行,江南地区以桐乡双庙诸的蚕花会最为隆重和精彩。吴江的盛泽镇在清代道光年间修建了先蚕庙,当地也称蚕花殿。每年蚕花会期间,当地蚕农都会前来祭拜,以求蚕神保佑。震泽不仅有蚕王殿,并且寺庙中一般都供有蚕神。富裕人家还会在墙上砌神龛,自家供奉蚕神。民国时期,蚕桑祭祀活动已经简化,但在采茧和缫丝之后,还是要拜谢蚕神。

如果剔除上述蚕月禁忌和蚕桑祭祀习俗中的迷信成分,就会发现其对于预防蚕病,鼓励民众养蚕,宣扬蚕桑文化,进而推动养蚕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表 1 江南地区主要的蚕桑习俗

风俗名称	主要地域	时间	含 义
晒蚕花	苏州、湖州	年初一	早晨多睡会,以免惊扰蚕花娘娘
鞭春牛	江南地区	立春前后	鞭春牛有宜于田蚕
蚕猫辟鼠	无锡、嘉兴、海宁、海盐	清明前后	鼠为养蚕大忌,蚕农通过祭猫来驱鼠
进蚕香	苏州、杭嘉湖平原	清明时节	祭各路神仙,保佑蚕儿健康
挑青螺、祛白虎	苏州、杭嘉湖平原	清明时节	祛除蚕祟
蚕花生日	杭嘉湖平原	农历腊月十二	纪念蚕花娘娘
轧蚕花	杭嘉湖平原	清明前后	蚕农们竞赴附近寺庙祭拜蚕花娘娘
扫蚕花地	海盐、海宁一带	清明前后	扫除晦气和灾祸,保佑蚕花丰收
请蚕花	桐乡、乌镇一带	蚕蚁孵出后	吉祥如意
演蚕花戏	海宁、桐乡、海盐一带	清明或收茧前后	
洗蚕花手	乌镇	每年春季	洗手能养好蚕
做茧圆吃蚕花包子	江南地区	蚕三眠以后	祭祀蚕花娘娘,后成为饮食习俗
烧田蚕(照田蚕)	苏州、湖州	除夕,年初一	火越旺,来年蚕田越好
谢蚕花	江南地区	端午晚上	酬谢蚕花娘娘,犒劳自己
点蚕花灯	苏州、湖州	除夕、年初一	希望来年蚕和稻都能丰收

(下转第 42 页)

① 乾隆《杭州府志》卷 74《风俗》1,引嘉靖《余杭县志》。

② [清]高铨:《吴兴蚕书》,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书,新繁沈氏家塾藏版。

③ [清]董升荣:《育蚕要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书,手抄本,版本不详。